

## 媒介不是人的延伸

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“后人类”批判

车致新

**摘要：**本文从 AlphaGo “人机围棋对抗赛”的问题切入，借助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批判，思考“人文学”在新世纪以来数字技术普遍化的历史-技术语境中所面临的处境。也就是说，思考“人”的问题在今天依然重要，但与此同时，在理论与方法上必须首先完成一场彻底的“范式革命”，才能真正有效地重拾“人文主义”的遗产，重启对“人”的思考。

**关键词：**人文学 媒介 基特勒 后人类

### 一、AlphaGo 之后的人文学

在被称为“人工智能元年”的 2016 年中，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领域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在其中最具象征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事件是在 2016 年 3 月 9 日至 15 日举办的一场“人机围棋对抗赛”——基于蒙特卡罗树搜索算法、大数据以及“深度学习”等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程序“阿尔法围棋”（AlphaGo）在五番棋比赛中以 4：1 的总比分完胜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。

在笔者看来，这场人机对抗赛，作为一种福柯意义上的“事件”，不是人工智能的线性发展历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，而是在人类的历史以及人-机关系的历史上的一次根本“断裂”，换言之，人工智能在这场围棋比赛中的胜利标志着“人”自身以及人-机关系的认识论转型。因为，人工智能在这次“世纪大战”中的胜利，不仅是对 1997 年 IBM

公司的超级计算机“深蓝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历史场景的延续；或者说，是在纯“计算”的意义上，人工智能程序终于实现了自其诞生以来的夙愿，即能够在围棋这一“完全信息博弈”中复杂程度最高的一项智力对抗（围棋每一步的盘面可能为3的361次方）中战胜人类；最重要的是，比“国际象棋”有着远为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“围棋”最终也被机器所攻克，这意味着围棋“艺术”在数千年中积淀而成的种种“理念”——例如棋手的“风格”、“感觉”，或棋型的“厚/薄”、“美/丑”——在转瞬之间就被“非人”的大数据和算法所解构和祛魅，这无疑意味着，“机器”第一次开始在人文与艺术——“人之为人”的专属领域——领域内也实现了对“人类”的超越<sup>①</sup>。自这次比赛之后，人与机器之间的“模仿”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颠倒，以前是人工智能需要人类棋谱进行早期学习，现在是人类棋手不得不去研究和模仿人工智能的下法。简言之，围棋这门“艺术”如果还会继续存在下去，它的主体将不再是“人类”。

与此同时，“人”所面临的困境的另一面是，人类的真实的“身体”——“人之为人”的物质基础——也已经被数字技术全面渗透。也就是说，无需等到人工智能或机器人从“外部”战胜和取代人类，所谓的“人”的概念自身已经变得面目全非。比如，在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，备受瞩目的“脑-机接口”（brain-computer interface）技术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（由人工智能控制的大脑植入物已完成初步的人体试验）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我们也许不得进入由“算法”操控人类大脑活动的“恶托邦”社会。而随着“身体”被各种科学技术“洞穿”，人类的“身体”与“意识”从此不再具有传统“人文主义”观念中封闭而自足的“内在性”，传统意义上的“人”与“机器”（或主体与技术）的二元对立，也由于“人”与“机器”共同组成的“赛博格”（Cyborg）的日益普及而变得含混模糊——在技术的意义上，“人

<sup>①</sup> 实际上，近年来人工智能在音乐、绘画、诗歌等各个艺术领域中都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。

类”已经无可避免地变成“后-人类”（post-human）。

言而总之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“人”都已经失去了“启蒙运动”以来的“中心”位置，“人”、“身体”、“意识”等种种“人文主义”观念在今天已经不再具备有效性与自明性。因此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这场“数字革命”所改写的不仅是传统“人文学”的研究对象——从“文本”到“超文本”、从胶片电影到数字电影、从传统绘画到“数字艺术”——也深刻地地质疑了传统“人文学”自身的合法性基础。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，企图停留在昔日人文主义传统的美丽“乡愁”中已是“反历史”的自欺欺人，更积极的做法是去重新寻找有效的理论资源，从而正面回应数字技术革命对“人文学”所提出的全新挑战，并在这一过程中反思与重建“人文学”自身。

在本文的有限篇幅内，笔者希望通过梳理与麦克卢汉的对话关系，初步地引入德国媒介研究的奠基性思想家弗里德里希·基特勒（Friedrich Kittler, 1943—2011）的相关思想。概括而言，在批判地继承传统媒介理论、香农的“信息论”以及福柯的谱系学等诸多异质性的思想资源基础上，在北美传播学研究与法德批判理论的跨学科、跨地域的对话中，基特勒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，发展出了一种能够打通（科学与人文）“两种文化”的独特研究范式<sup>①</sup>。因此，在今日语境下重访基特勒的思想，也许能够为“人文学”走出面对技术问题时的“困境”提供一些启示。

## 二、基特勒之后的媒介理论

毋庸置疑，真正意义上的“媒介理论”起源于麦克卢汉的经典命题：“媒介即消息”（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）。麦克卢汉在1964

<sup>①</sup> 基特勒所开创的学术路径通常也被后人“追认”为近年来在欧美学界十分热门的“媒介考古学”的鼻祖，但这种标签式的概括并不完全准确，基特勒晚年也明确表示了自己并不属于“媒介考古学”。

年的代表作《理解媒介：人的延伸》（*Understanding Media: The Extensions of Man*）中提出的这个耐人寻味的“谜语”<sup>①</sup>，开启了一种真正的针对于“媒介”自身——重“载体”而非“信息”，重“形式”而非“内容”，重“手段”而非“目的”——的思考路径，其革命性的影响范围绝不仅仅限于“媒介研究”或“传播学”，更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如今已经遍及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“媒介转向”（*media turn*）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由于在研究中过于重视“媒介技术”维度而忽视了在媒介之外的“社会”或“历史”维度，麦克卢汉也被他的批评者们视为“技术决定论”（*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*）的典型代表。

然而，这些批评者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—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真正“底色”早已体现为《理解媒介：人的延伸》一书的副标题，即“人的延伸”。换言之，无论多么强调“媒介”与“技术”自身的重要性，麦克卢汉的思想其实依然难以摆脱“人类中心主义”或“主体主义”的传统思维模式，因为从一开始，麦克卢汉就以“人”为参照标准来界定“媒介”这一概念，并且明确地将“媒介”等同于一种对“人”的“延伸”——换言之，副标题作为一种对主标题的“解释”，在全书开始之前，就已经把“理解媒介”的问题置换为了理解“人的延伸”的问题。而众所周知的是，在《理解媒介》的具体论述中，任何一种“媒介”都被麦克卢汉视为对某种与之相对应的人体“感官”的延伸（和“截除”），例如车轮是“腿脚”的延伸，服装是“皮肤”的延伸，电子技术是“中枢神经”的延伸——简而言之，“媒介”被麦克卢汉等同于用以延伸人类身体感官的种种“假肢”（*prostheses*），如基特勒所指出，“媒介即延伸”也就意味着“……某种感知器官的技术性假肢，

<sup>①</sup> 在“媒介即消息”中，麦克卢汉对“消息”（*message*）一词的选用颇有深意，这一点往往为人所忽略（在汉语翻译之后尤其难以体现原文中的“双关”），即这句话中的 *message* 不仅指媒介研究或“信息论”意义上的“信息”（*information*），也隐晦地指向具有神学意味的“消息”，后者体现了麦克卢汉自身的天主教思想与技术哲学的奇特耦合，当然，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，这句话都是为了凸显“媒介”本身所具有的重大意义。

即媒介，替换了这一感知器官的自然的或生理学的功能”<sup>①</sup>。

然而，问题的关键是，在麦克卢汉的理论建构中，媒介技术与人类身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能够互相影响的“双向”关系，而是一种“单向”的、决定性的关系。换言之，“身体”决定“媒介”的这一因果逻辑顺序绝不能颠倒过来。首先，正如基特勒敏锐地指出，麦克卢汉的这种思维方式与他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不无关联，因为麦克卢汉“……最初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，他对感知的理解比对电子设备的理解更多。因此他试图根据‘身体’来思考‘技术’，而不是反过来”<sup>②</sup>。一言以蔽之，“身体”与“人类”才是麦克卢汉思考媒介与技术的出发点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而言，与其说是一种“技术决定论”，不如说是“人文主义”传统在数字时代的“延伸”。

现在，让我们的目光转向基特勒。作为在麦克卢汉之后西方思想界最重要的“媒介理论家”，基特勒一方面无疑承继了麦克卢汉开创的“媒介即消息”的这一重要的思想传统，但与此同时，对于“媒介即人的延伸”——这个在麦克卢汉的思想体系中不言自明、未能反思的基本“前提”——基特勒却始终采取了坚决的否定态度。在基特勒看来，“一切媒介的主体自然是人类”这一观念并非看上去那么“自然”，这种“人类中心主义”论述无非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建构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，基特勒的思想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分道扬镳，通过批判性地重访“信息论”、“控制论”等科学哲学思想，以及福柯、拉康等法国结构主义者的理论资源，基特勒试图在麦克卢汉把“媒介”视为“人的延伸”的这一经典论述之后，重新寻找一条真正从媒介自身出发，并突破“人类中心主义”的思维定式的研究路径，正如基特勒在1996年的一次访谈中所言：

<sup>①</sup> Friedrich Kittler, *Optical Media*, trans. Anthony Enns,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Durham Peters (Cambridge: Polity Press, 2010), p.29.

<sup>②</sup> Ibid., p.30.



创于1897

我并不相信这种古老的命题，即媒介是身体的假肢……在英格兰，阿兰·图灵或丘吉尔要找出一种击败德国的无线电战的方法，最后他们通过电脑破译了无线电信号——于是德军一败涂地，而这场战争就终结于此……这样的历史并不依赖于一位历史演员的主体能动性。而我认为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：媒介（包括书和书面语）的发展是独立于身体的。<sup>①</sup>

提出这样的反-人类中心主义的“媒介”观念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空想，它依然源自于基特勒对各种媒介历史自身的谱系学研究。在对媒介技术的历史性考察中，基特勒发现每一种媒介的发展其实都是在回应其他媒介的发展，而不是为了回应人类的身体-感官的需求，换言之，在基特勒的历史叙述中，媒介技术的历史有一套只属于“自己”的发展逻辑。因此，媒介技术不仅是“完全独立于个人的，甚至是集体的身体”；而且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会对人类的“感知和器官造成压倒性的影响”<sup>②</sup>。总而言之，与麦克卢汉的论断恰恰相反，在基特勒看来，人类的“身体”及其历史性变化不再是“决定”着媒介技术变化的动因，而只是媒介技术自身发展的一种后果/效果。

为了进一步理解基特勒对人类身体与媒介技术的关系的思考，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基特勒晚年在柏林大学的演讲集《光学媒介》（*optical media*）中所提出的两个简短但十分重要的案例。回顾这两个具体的历史“事件”，或者说思考基特勒对它们做出的独到“阐释”，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“人”、“身体”、“感官”等在20世纪的“身体转向”之后的“关键词”在基特勒的媒介理论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，也有助于我们管窥基特勒思想的基本特征，即他是如何从媒介技术角度强力“介入”传统人文领域，从而开启一种“激进的”不再为“人”这一

<sup>①</sup> Matthew Griffin, Susanne Herrmann and Friedrich A. Kittler, “Technologies of Writing: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. Kittler”, in *New Literary History*, vol. 27, No. 4, 1996, p.738.

<sup>②</sup> Friedrich Kittler, *Optical Media*, p.30.

观念保留中心位置的全新范式。

第一个案例有关古希腊，或者说有关“哲学”的历史起源。这个问题本身看起来十分简单直接——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当时使用什么“工具”、或曰“媒介”来进行“哲学”的工作？从今天的角度回看，该问题“实际的”答案显而易见，正如媒介历史学家的研究所证明，如柏拉图等古希腊的哲学家所使用的书写“工具”无疑是当新发明的、在政府推动下普及的“希腊元音字母”系统。然而，基特勒并不满足于这种“实证性”的历史考据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：“……哲学家以他们的‘灵魂’来进行哲学化……留给苏格拉底和他热情的对话者们的问题只是去解释什么是‘灵魂’”<sup>①</sup>。这一回答无可辩驳，然而关键的反转还在后面，基特勒进一步指出，在古希腊对所谓的“灵魂”的种种定义方式中最重要的就是众所周知的“白板说”，即把人的“灵魂”视为一种“白板”（*tabula rasa*），然而有趣的是，“白板说”这一哲学隐喻显然是直接源于当时人们所使用的书写“媒介”，即古希腊人用来书写的基本工具“蜡板”，换言之，古希腊人把“灵魂”想象为一种有待书写的“白板”的基本前提是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着一种可以用来记录书写的“板”。通过在阐释中的双重反转，基特勒把对这个问题再次锁回了“媒介”，也把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问题，提升为涉及媒介技术与人文学（哲学）之根本关系的一个关键的“元问题”。正如基特勒在分析的最后所指出：“在不仅仅是隐喻的一种隐喻的伪装之下，这种新的产生了‘灵魂’的媒介技术最终成为新发明的‘灵魂’的消失点（*vanishing point*）”<sup>②</sup>。也就是说，“媒介”（蜡板）在生产了“人”（灵魂）之后又变得不再“可见”，从而导致了“人”之观念（而不是“媒介”）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起点，而与此同时，“媒介”问题则像“月之暗面”一般消失在西方哲学传统的视域之外。

① Friedrich Kittler, *Optical Media*, p.34.

② Ibid.

与上述“古希腊”的案例相对应，基特勒所分析的第二个案例跳转到了西方历史的另一端，即“电影”技术刚刚发明的1900年前后。与第一个案例的“严肃”的哲学有所不同，这个案例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普通“经验”。简言之，在1900年前后，出现了众多的有关登山者从高处跌落（或是溺水等其他事故）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研究——也许只是因为当时科学家开始对这类事故产生了兴趣，而不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本身变得更多——在这些“科学”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十分著名的“理论”：这些事故的经历者在从高处掉落或溺水等“濒死”状态中，他们所体验到的并不仅仅是恐怖或惊慌，而是非常“有趣”的一种视觉现象。在“死亡”的那一瞬间，生前的种种回忆会像“放电影”一样以极快地速度在濒死者眼前逐一展现。沿着基特勒对第一个案例的分析思路，我们不难理解这个现代案例所蕴含的理论意义——在媒介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意义上，1900年的“电影”正好比古希腊的“蜡板”，它们都为各自时代的人们想象自己的“灵魂”提供了媒介-物质基础，“在1900年，‘灵魂’突然不再是柏拉图所描述的以蜡板或书本形式出现的一种记忆，‘灵魂’如今实现了技术升级，变型为‘电影’”。

总而言之，通过对“蜡板”和“电影”这两个历史案例的分析，基特勒所试图思考的是“媒介”与“人”的关系，而基特勒得出的结论与麦克卢汉的经典论述截然相反：“在媒介提供了模型与隐喻之前，我们对自身的感官一无所知。”<sup>①</sup> 这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“蜡板”这一媒介技术在前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根本无从构想“灵魂”这一观念，如果没有“电影”这一视觉性的“技术媒介”在19世纪末的发明和普及，在科学话语与日常生活中，也绝不可能出现一种显然是完全源自于“电影”的媒介形式的“濒死体验”。用基特勒的话来说：“对于‘灵魂’或‘人类’，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这些技术性的‘小玩意’。”<sup>②</sup> 正如这两个例子中的“蜡板”或“电影”，而且，根据尼采-福柯式

① Friedrich Kittler, *Optical Media*, p.34.

② *Ibid.*, p.35.

的“事件”历史观，基特勒还进一步指出，在这里也并不存在任何“必然性”或“决定论”，因为“……采取某种技术媒介作为想象‘人类’或‘灵魂’的模型与隐喻的历史倾向，正如我所例示，是完全偶然的”<sup>①</sup>，换言之，同一个观念，例如“灵魂”，在各个的历史时期可以源于全然不同的媒介形式——既可以是蜡板、电影，也可以是绘画、音乐、小说——在这背后没有任何“决定性”的必然逻辑可言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为基特勒所强调的“历史-技术先验性”，因为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（古希腊或是今天的数字时代），都必须先有“媒介-技术”才有“人”、“灵魂”、“感官”等与之对应的派生观念，或者说，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基础是使这些“超验的”人文主义观念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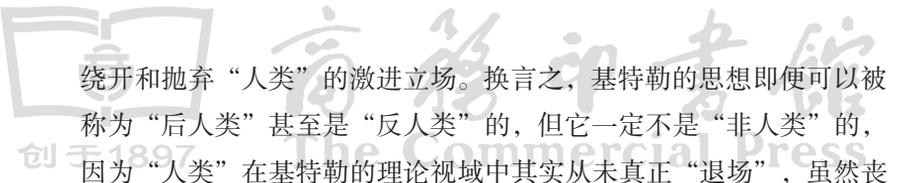
基特勒对“人”与“技术”的关系曾经做出过如下总结：

对于技术媒介而言，如果它们都像电影或电视那样入侵我们的感官，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为“敌人”（但没有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《启蒙辩证法》中讨论无线电和电视的章节而成为时尚的文化悲观主义）。因为根据卡尔·施密特，“敌人”就是我们自身问题的体现。之所以存在着‘媒介’，正是由于尼采所说的“人”是一种性质尚未固定的动物。而恰恰是这种——不是辩证的而是排斥性和对抗性的——关系保证了技术之历史并非如此‘反人类’以至于它与人类根本无关。<sup>②</sup>

在这段精准而微妙的表述中——除了对法兰克福学派一贯的“不屑一顾”之外——我们不难发现，基特勒对麦克卢汉所代表的“人类中心主义”的传统媒介理论的“后人类”批判，以及基特勒对媒介技术发展独立于人类-身体的“自治性”维度的强调，并不意味着一种完全

① Friedrich Kittler, *Optical Media*, p.35.

② Ibid., p.36.



绕开和抛弃“人类”的激进立场。换言之，基特勒的思想即便可以被称为“后人类”甚至是“反人类”的，但它一定不是“非人类”的，因为“人类”在基特勒的理论视域中其实从未真正“退场”，虽然丧失了以往的优先性与中心性，虽然被媒介技术所重写，但“人”（在观念与历史的双重意义上）依然是基特勒所必须处理的“问题域”中一个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。

不言而喻的是，基特勒的处境也就是“人文学”在新世纪以来，即在数字技术的普遍化的历史-技术语境中所面对的处境。也就是说，思考“人”的问题在今天依然重要，但与此同时，在理论与方法上必须首先完成一场彻底的“范式革命”，才可能真正有效地重拾“人文主义”的遗产，重启对“人”的思考。

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